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丛书(三)

“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

(1958 — 1965)

.32
-65

柳随年 吴群敢 主编

责任编辑：许文锋 周学俭
封面设计：张若一

(内部发行)

“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

(1958—1965)

Dayuejin he Tiaozheng Shiqi de Guomin Jingji

柳随年 吴群敢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78/16·字数 150,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400

统一书号：4093·116

定价：0.62元

目 录

一、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探索	(1)
(一) 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1)
(二) 探索的初步成果	(4)
(三)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	(12)
二、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20)
(一) 初期的酝酿和北戴河会议的召开	(20)
(二) 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高潮	(28)
(三)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	(36)
三、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开始初步纠“左”	(40)
(一) 人民公社运动的收缩、整顿	(40)
(二) 调整经济指标及有关措施	(48)
四、庐山会议后继续发展“左”的错误	(58)
(一) 从纠“左”转向反右	(58)
(二) 1960年上半年的新“跃进”	(63)
(三) 比例失调的主要表现	(71)
五、转向全面调整经济的初期	(83)
(一)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	(83)
(二) 逐步认识、转变的过程	(85)
六、全面调整的决定性阶段	(97)
(一) 调整必先退够的决策	(97)
(二) 进一步大幅度调整的主要措施	(102)

(三) 经济形势的转折	(119)
七、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三年	(122)
(一) 继续调整的决策	(122)
(二) 在新形势下调整的特点	(126)
(三) 调整任务的圆满完成	(139)
八、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143)
(一) 建设的成就	(143)
(二) 历史的经验	(158)
附录一 统计资料	(170)
附录二 1958—1965 年经济大事记	(175)
后 记	(232)

一、社会主义建设 新道路的探索

(一) 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1956 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开始大规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

当时，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由 1952 年的 21.3%，上升到 92.9%；各个部门的经济活动都以不同的形式纳入了国家的统一计划，或者受着计划的指导。我国基本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消灭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由于我国是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大国，新建立的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旧制度的残余和旧传统的严重影响还未铲除，国内外阶级敌人又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因而继续在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进行阶级斗争，仍然是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革命

时期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已经由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我国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骨干企业，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经验，这是继续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但是，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过三年的恢复和五年的发展，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 24.9%，1957 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只有 142 元。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已经成为迫切的问题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1956 年 1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先进水平。同时，中共中央正式将拟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并向全国人民公布；根据全国知识分子会议的建议，集中一批科学家编制了《1956~1967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些宏伟的规划，向全国人民展现了经济与科学发展的美好远景。

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编制、并由“八大”正式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具体地规定第二个五年计划

的基本任务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五年内的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 35%，钢产量 1962 年达到 1,050—1,200 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一五”时期的 35% 增到 40% 左右，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一五”时期增长一倍左右，职工和农民的平均收入将增加 25% 至 30%。这就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的奋斗目标。

在这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最突出的是我国经济建设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曾经成功地创造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即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在农业、手工业方面，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通过逐步集体化的办法，把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引向社会主义。但在经济建设方面，主要是工业建设与计划管理，由于过去我们基本上没有组织、管理过现代化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比较系统地学

习模仿了苏联建设的现成经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已有近三十年经济建设的经验，向他们学习是必要的，而且苏联也确实帮助我们顺利地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中国的国情与苏联有所不同。我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现代工业起步比发达的国家晚了一、二个世纪，加上我国人口众多、底子薄，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不经历更加艰苦、更加长期的斗争。同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也表明苏联的经济建设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有许多有益的经验，但是确实也存在不少问题。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了。如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扩大积累，忽视群众生活；经济管理体制集中过多过死等，更使我们看到了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局限性。

因此，在我们开始进入大规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形势迫使我们必须象民主革命时期寻求中国的革命道路，或者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那样，根据中国的国情，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二）探索的初步成果

对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探索，是从1956年初开始的。这个期间探索的成果，突出地表现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党的“八大”会议和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

在1956年上半年，根据党中央的要求，34个经济主管部门分别向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作了详细的汇报。1956年4月，毛泽东集中了党中央集体的智慧，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任务提到了全党的面前，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

这个报告以苏联为鉴戒，初步总结了过去几年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对今后建设工作中需要着重处理好的十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也要依靠工农基本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对反动力量也要正确处理，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国内外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都调动起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论十大关系》阐述了经济建设中几个重要原则，归纳起来主要是：第一，必须正确处理建设中积累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必须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者利益，无论只顾哪一个，都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也要关心群众，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但决不能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要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以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增加资金积累，促进重工业的发展。第二，合理解决经济建设的布局。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但是必须同时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基地，使我国有更多的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第

三,调整经济管理体制。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但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要给工厂一点自主权,使各个生产单位都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第四,处理好学习与创新的关系。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我们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1956年下半年,围绕中央提出的探索新道路的题目,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同志都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探索的成果,比较集中地反映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所制定的路线,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八大”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正确地分析了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八大”继续坚持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详细地论述了这个方针。他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第二个五

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提出：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同时，要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要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要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陈云总结了1956年出现的冒进及以后调整的经验，对如何贯彻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指出：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时候，能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就在于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要防止出现经济建设规模超出国力的危险。第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平衡，而且应当略有结余。第二，重要原材料的供应，应当有分配的秩序，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第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提供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第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第五，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安排建设规模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与农业发展是否适应。薄一波还试图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探求保持经济稳定的若干具体数量界限。他提出：在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财政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略高一点。这些探索，对进一步

掌握、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八大”前后，研究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陈云从我国社会实际出发，针对我国商品生产还很不发达，以及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对产品需求十分复杂等具体情况，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及如何利用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方针性的意见。他认为：今后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按照计划生产，但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个意见被“八大”决议所采纳。后来，毛泽东提出关于要发展商品生产重视价值规律的意见。刘少奇针对我国生产资料供应完全沿用苏联办法，实行单一的自上而下计划生产和分配调拨所存在的弊病，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进一步明确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发挥价值规律与市场作用的思想。

“八大”前后，对工业企业及农业合作社内部的组织管理制度也作了探讨和改进。针对苏联企业管理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群众路线所引起的弊病，“八大”正式决定：工业企业中建立以党委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凡是重大问题都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和共同决定，凡是日常的工作，都应当由专人分工负责。以后，邓小平建议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以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群

众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根据农业合作化以后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农业发展主要依靠农民的积极性等具体情况，邓子恢提出在合作社内部，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是巩固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以后中央还确定农业合作社实行民主办社制度，让农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到了1957年2月，毛泽东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理论上阐述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以后，社会矛盾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怎样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关系着无产阶级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为了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并针对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及我国国内提出的问题，我们党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已经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概念，不过当时是就国际范围讲的。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的思想。

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的，但这种制度还不巩固，某些环节还不完善，人民群众

对于新制度还不大习惯。这些不完善、不巩固、不习惯的方面就表现为现阶段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这些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与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正是这些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不断前进。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在政治上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一系列方针。讲话指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这篇讲话重申了必须正确处理农、轻、重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经济建设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实行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这才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社会上长期存在着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通过国家计划调节，求得供需平衡，这就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由上可见，自1956年以来，我们党以苏联为鉴戒，总结

我国经济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经验，并且考虑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的新情况，在短短的一年中，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道路的理论、方针的探索取得了重大成果。这些探索归纳起来大致是：第一，正确地分析和论断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初期国内的主要矛盾，确定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二，改变过去主要依靠阶级斗争来推动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基本作法，确定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作为发展经济的动力。第三，从我国国民经济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 80% 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经济与国防等基本比例关系，坚持统筹兼顾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第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改革经济管理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调整中央、地方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此期间，我们党及时将理论的探索应用于实践。在生产关系方面，按照《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原则，比较有效地调整了企业、合作社与国家之间，企业和合作社内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健全了工业企业与农业合作社内部的民主管理制度，及时解决了农业、手工业与私营工商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合并过多、规模过大、统得过死等问题。对于商业、市场管理，根据陈云在“八大”会议上的意见，进行了一些研究、试验。特别是通过整风，集中地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并且对广大群众普遍地进行了

社会主义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发展生产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的积极性。在经济建设方面，加强了综合平衡，及时纠正了1956年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适当调整了发展速度，缩小了建设规模，避免了进一步的比例失调，既保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又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由于这些调整和改革工作，就使1957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份之一。事实表明，这两年的探索，方向是正确的，成果是显著的。

（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

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探索，总的要求是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寻求如何才能又好又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早在1955年，毛泽东多次讲过领导各项工作要采取又多又快又好的方法问题。在听取中央各财经部门工作汇报时，周恩来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李富春补充说还要省。这些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周恩来便在1956年春提出了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①。1957年10月，毛泽东又重提这个问题，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

^① 《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许建华文。

过努力是可能的。那就要多开小钢厂。我看那个年产三、五万吨的钢厂和七、八万吨的钢厂要多开，很有用处。再有中等的，三、四十万吨的钢厂，也要开。”他还说：“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①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这个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说：“党中央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

^① 毛泽东著：《做革命的促进派》。